



经济至上主义 应让位于文化发展

——访日本著名政治家古贺诚先生

□川村雄介 薛军

古贺诚先生生于1940年,是日本政坛卓有影响力的著名政治家,宏池会(古贺派)会长,也是有名的知中派人士。古贺先生现任日本众议院议员,曾历任日本运输大臣、自民党干事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职。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亚太三人行”栏目第九期,也是2012年第一期的访谈,在日本大和总研的多媒体工作室顺利进行。

受访者为日本著名政治家、日本众议院议员古贺诚先生。三人就媒体与政治、国家利益、产业与均衡发展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我认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物质和金钱看做是衡量幸福的尺度,这是对幸福观的误解。

4 保护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题

川村雄介:我去长崎的时候深切地体会到,从长崎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上车辆非常少;而首都高速公路上时常汽车多得不能移动。首都高速的通行费是700日元,长崎机场到市区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是600日元,我感觉消费者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花的钱正在用来补贴像长崎这样的地方经济。去地方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不景气,在东京就看不出经济不景气,民众依然买名牌包,在高档餐厅享受美食,嘴上说经济很困难但依然过得很富足。地方上的一家人一年到头却要分散各地。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财富过多地被聚集在了大城市。也许地方上的人会认为,真正的政治应该是国家努力做到整体平衡,尽量缩小首都圈和地方的差距。

中,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企业凭借自身努力就可以实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第一产业仅靠自己奋斗的话会受到制约。针对这种情况,仅仅依靠一定的政策补助是肯定不行的。国家平衡发展应该像高速公路和新干线那样,无论在都市还是农村都一样畅通和延伸,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平衡。总之,每年财政支出应该向地方转移比例趋于均衡,合理的分配财政支出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怎样合理地向地方拨款和保护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题。

薛军:假设时间倒退到20—30年前的话,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让日本的农业有活力?

古贺诚:日本现在的宪法规定,作为户主的父辈死亡后,其所有土地要平均分给他的孩子。这样一来,农田的产权越

来越分散。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将土地集中。同时,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很多农业生产者已经无法再继续劳动,他们的农业生产也后继无人。如何将这些人的土地提供给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提供的同时,政府要给予什么样的援助?现在到了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的的时候了。30年前,日本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保护传承下来的人工生产技术和人工耕作的传统。我个人认为,农业机械化生产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农业问题并不仅仅是粮食生产问题,还有财政如何对农业进行补贴、应付自然灾害、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对农业生产人员在什么范围及何等程度进行补助等问题。所以,我认为巩固发展第一产业是政治上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国家平衡发展应该像高速公路和新干线那样,无论在都市还是农村都一样畅通和延伸,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平衡。

5 媒体促进政治秀 影响日本政局稳定

川村雄介:日本在经历了从“55年体制”(由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的社民党构成的执政体制——编者注)等确立起来的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局面,到自民党政权交替这一改变前后开始,国民意识好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大家对政治家的领导力还抱有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但是现在,政治家已经没有了大家所期待的政治领导力了。如此一来,日本人开始期待强大领导力的出现。国家陷入目前的困境,国民都期待可以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对吗?

古贺诚:确实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从事国政的人最感到惭愧的地方。从我第一次以国会议员身份去中国访问开始算起,到现在的野田首相已经是第19位首相了。31年里出现19位首相,其中除去中曾根和小泉两任首相执政的10年,另外17位只执政21年,每位首相平均

任期只有1年多,这确实是政治窘境。我认为这里面新闻媒体的责任也很大。真正具有治国理念和信念的政治家不一定能够当选,现在的政治家大多只重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国民也只是关注他们的政治秀。自民党人也有一些缺点,小泉先生和他领导下的政治宣传也应有有一定责任。政治宣传就像播放体育比赛或者演员演出的戏剧一样。我认为这是“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的象征,在明白这些道理的过程中,日本也不知不觉走向衰弱。如果只会作政治秀,哗众取宠,有虚荣心的人才可以成为政治家的话,那就糟糕了。

川村雄介:最近给我感受非常深的是新媒体的迅速扩张,他们匿名发布的难辨真伪的信息肆意泛滥,我想中国也有同样的现象。一部分媒体已经不再是真实信息的传播者,而成为了追逐丑闻

的机构。而大众传媒却没有进行自我批判和反省,您认为新闻媒体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古贺诚:政治需要结果,如果政治没有结果,那么就没有什么责任和使命之说了。但是,现在的媒体是谁都不报道结果和追踪结果,我认为这是媒体界最欠缺的部分。

薛军:针对“3·11”日本大地震,很多人质疑政府当时采取的对策。您对此有何看法?

古贺诚:可以说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灾后重建复兴,特别是在处理核电站问题上,只有自我作秀,哗众取宠式的发言,毫无进度可言。我认为这种政治上反应的迟缓充分暴露了当时菅直人内阁的窘境:官僚涣散、内閣混乱。总理大臣需要将所有的责任集于一身,将组织的能力发挥到100%甚至120%。相反,政府在重建复兴中表现出的是无能无策。

1 从高速公路看中国高速发展

川村雄介:今天我们“亚太三人行”邀请到的嘉宾,是日本政界的重量级人物——日本自民党的古贺诚先生。古贺先生同时也是日本政界有名的知中派。首先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同中国结缘的?

古贺诚:非常感谢!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国家。我从政初始就加入了宏池会。宏池会以及它的代表人物大平正芳先生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构建两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背景,宏池会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另外,从我个人来说,我的父亲战死于太平洋战争。所以,我非常关心日中关系,并认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从各方面来讲都应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也必须对中国有所交待,比如具有代表性的靖国神社问题。

川村雄介:您初次访问中国是什么时候?

古贺诚:是我刚戴上徽章就任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就是1982年铃木善幸首相时期。

川村雄介:在随后同中国近30年的交流中,您有什么难忘的回忆或者让您感觉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古贺诚:我没有任何不好的回忆。每次去中国,我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会碰到很多让我吃惊的事情。每去一次,我都会发现中国的高速公路在不断增加,中国人的出行方式也慢慢由自行车改为汽车,这些都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日本第一条高速公路是1963年建成的,截止到今天,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只有9700千米。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在1988年建成的,我记得1999年,中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达到6.5万千米,速度非常惊人。就像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看到的情形一样,我每次去中国都会对其各个领域的改革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富足留下深刻印象。另外,中国非常重视礼遇,即使是乘坐火车,中国的工作人员也会用车把我送到站,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列队欢送,这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2 “国家的根本是家族和家庭”

川村雄介:最近,因为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中。但中国政府行动迅速有力,在控制经济局势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从中看到了中国政府极强的领导力和执行能力。相反,在被称作“失去的20年”的日本,政治领导力在逐渐减弱,特别是最近几年,我感觉日本全体国民对政治缺乏信任。对此您如何看待?

古贺诚:我与您观点一致,对此我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不否认两国政体不同的原因。日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经济至上主义。日本政府领导力不足也是与这种体制相关的。民主是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的,并且日本的发展阶段已经进入成熟期,老龄化也在继续,这些事情都正在到来。

薛军: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失去的20年”的原因是什么?

古贺诚:在国家发展方向定位上,日本有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的精神文化领域,即存在日本国民多样化的幸福价值观之中的“国家的根本是家族和家庭”。但关于这一点,日本的变革有些晚了。我认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物质和金钱看做是衡量幸福的尺度,这是对幸福观的误解。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国家利益不是金钱而是文化。在让世界敬佩日本精神文化方面的转变开始得有些晚了。我十分尊敬的大平正芳先生在执政期间对日本国民有两个承诺,一个是完善家庭基础,另一个是田园都市构想。很遗憾这两个承诺都没有实现。

在战后的66年里,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也创造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产品,但我们国家民主主义最大的不足是人才培养的失败。



川村雄介,本报特约海外经济学家、日本大和总研专务理事、日本岩手县震灾复兴委员会委员。



薛军,本报特约海外经济学家、日本长崎大学准教授、日本证券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3 政策失衡是第一产业变脆弱的最大原因

古贺诚:日本在发展过程中首都圈和地方之间出现了差距,忽视了地方的发展。一个国家不能过于重视首都圈的发展,地方的活力才是国家繁荣的基础。所以,我想中国不应重蹈日本覆辙,不能再出现当前日本存在的首都圈和地方差距过大的局面。地方经济萧条最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最具有活力的第一产业,如农业、林业和渔业。日本战后自民党政权最失败的政策就是忽视第一产业发展。我刚当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日本的国家预算大约有70兆日元,其中投入第一产业的农林水产省的预算是3兆4千日元。今年的国家预算超过了92兆日元,但是分配到农林水产省的预算只有2兆4千日元。虽然总预算增加了,但是分配到第一产业的资金却减

少了。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从我刚从政时的3000万减少到目前的不足260万。

薛军:第一产业没有活力将会导致整个国家没有活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目前的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在不断减少。希望您就此多谈一下您的看法和建议。

古贺诚:日本等资源匮乏的国家是通过发展技术和加工领域,即靠外需使国家富裕的,这虽然很重要,但如果过于侧重这一经济模式的话就会出现政策失衡。政策失衡是目前为止第一产业变得如此脆弱的最大原因。不论技术和加工领域如何受到重视,保护和发展第一产业都是国家的责任。我认为这实施起来会很困难,需要有勇气去做。

6 日本宪法应平衡权利和义务关系

川村雄介:早就听说古贺先生善于灵活运用官僚机构,也深得官僚同仁的信任。但是,近10年来大家突然都在说官僚不好,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古贺诚:上台两年来的民主党政权和自民党政权在很多方面有很大不同。日本是政党政治,因此国家和国民的命运可以说都受政党的影响。如果执政党变更,整个国家当然也会发生大变化,刚才说的就是许多大变化中的一个。相对于政治家,官僚的知识经验要高很多层次。政府的大臣、党的三大头脑以及政务官考虑的是如何充分调动官僚的能力。

与其去批评官僚的经验和能力的不足,不如去检讨政治主导。在战后的66年里,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也创造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产品,但我们国家民主主义最大的不足是人才培养的失败。

川村雄介:人才培养的失败,作为曾经做过大学教师的我,对此也深有感触。

古贺诚:国家的主体是人,但日本的人才培养却失败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会失败?很遗憾的是日本教职员协会不断扩张控制了日本教育第一线,这是事实。那么,日本教职员协会的势力是如何发展成当前局面的?我认为这与宪

法有关。我曾说过,因日本宪法第9条而闻名的“和平宪法”是日本的世界遗产,这第9条十分重要。但是,现行宪法的第三章“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要修改的,如果不修改这章,我们就无法恢复家族和家庭的原貌。第三章的内容由第10条开始到第40条为止的内容构成,其中仅有三条讲到了义务,除了纳税、劳动和接受义务教育这三条个人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外,其它的都是权利。因此,我认为修改宪法很有必要。一个日本国民,不仅要享受权利也必须要履行义务,否则将会失去平衡。

7 需要以100年的眼光看待日中关系

川村雄介:最后,又到了“日中关系展望”这个本对话的固定栏目。日中双边关系,今后在各个方面都越来越重要了。根据您的经验,对今后的日中关系发展有哪些建议?

古贺诚:我认为在日中交流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方面,其他国家是无法相比的。

尽管有一段不太好的时期,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国如何跨越这段历史。很遗憾的是当前的日本渐渐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固有的精神文化,对中国来说,日本成了没有魅力的国家。经济方面的交流,是可以进行改善和改革的,但在精神问题方面就不同了,要改善彼此的信赖关系须待时

日。我认为,日中两国在交往中应该坦诚明确地表述各自的观点。如果真能这样交往下去的话,日中交流不仅能源远流长,而且两国能互相信任、和平相处、再续辉煌,也会建立一条比现在更深厚的感情纽带。为了日本也为了中国,我们需要以50年乃至100年的眼光来看待日中关系。